

# 論香山海洋文化的發展和意義

## 兼論澳門對香山文化的影響

黃鴻釗\*

### 水國香山的文化特質

海洋文化是人類在海洋環境條件下所創造出來的精神的和物質的文化。從本質上說，它是人類與海洋互動關係的產物。

嶺南地區瀕臨南海，嶺南文化中的三個分支廣府文化、潮汕文化和客家文化都與海洋文化有密切關係。處在南海最邊緣地帶的香山，是嶺南海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古代香山沿海地區是中國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通道，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中心，又是中國人走向世界的重要門戶。因之，海洋文化是香山文化最基本的特徵，是最活躍而又最輝煌的方面，更是近代香山文化繁榮的根源。

香山具有海洋地理的特質。古時的香山島在今石岐以南、澳門以北的丘陵地帶，為古伶仃洋上的孤島。香山島的山是指五桂山，它是當地最高的山峰。據《太平寰宇記》記載：

東莞縣香山在縣南隔海三百里，地多神仙花卉，故曰香山。<sup>(1)</sup>

香山島在春秋戰國時期為百越海嶼之地。秦始皇三十三年（西元前214年）屬南海郡之番禺縣地；晉咸和六年（331年）屬東官郡地，隋開皇十年（590年）東官郡改為寶安縣。香山島屬寶安縣，後來又屬東莞縣。唐代仍稱香山島。宋代

以後，香山與大陸連成一片，並且被批准建立縣治。但香山人仍以水國海島自居。時至明代，香山人仍自稱“香山，水國也”<sup>(2)</sup>，說它本是個海島。《永樂大典》也明確指出：

香山為邑，海中一島耳，其地最狹，其民最貧。<sup>(3)</sup>

香山島雖早已與大陸相連，但仍然保存面積廣大的海域和大量的附屬島嶼。直到20世紀50年代，香山時已易名中山縣，縣境內島嶼海陸面積仍有約1,800平方公里。其中陸地面積為200平方公里，約及海面的十分之一。大小島嶼共六十三個，分為十個島群。<sup>(4)</sup>

一、橫琴各島：大橫琴、九澳（路環）、小橫琴、雞頸（氹仔）、芒洲（大岡）、香洲（內島）石欄島（水島）；

二、交杯各島：交杯沙（草鞋洲）、交杯島（雙柱）、橫洲（橫島）、洲仔、東石（細岡）、西石（竹根洲）、鶴洲。

三、三灶各島：三灶島、馬鬃、大岡、二岡、石灣、紅坎山島（大門山）；

四、大霖各島：大霖、小霖、大木迺、小木迺、白藤、三板；

五、南水各島：南水島、北水島、雞心洲；

六、高欄各島：高欄島、三牙石、青洲、圓洲（二浪）、蚊洲（三浪）、蚊洲仔；

\*黃鴻釗，南京大學歷史學教授，澳門史專家。



七、荷包各島：大杧島、杧仔、長連排、三角山及乾排、賴洲及賴爪、荷包島（牛角山）；

八、榕樹頭各島：榕樹頭、青洲、三角山、大碌、小碌、大流洲（大頭洲）、赤灘（赤洲）、蓑衣石、三牙排（三礁石）；

九、西萬山群島：東澳（獅澳）、大浪烈（北浪烈）、小浪烈（南浪烈）、黃茅、小蒲台（浮台石）；

十、東萬山群島：大萬山（老萬山）、小萬山（西澳）、白瀝（大蒲台）、阿島（阿澳）、虎洲（橫洲）、竹洲（竹洲灣）、竹灣（洲仔）。

這些大大小小的島嶼包圍着香山海岸，就像一串珍珠灑落在南海之濱。星羅棋佈的島群，為香山海洋文化提供了充分的地理條件。

由於香山島處在海洋包圍之中，因此，香山先民保持着向海洋發展的習性。史前的文化遺址，包括唐宋時期的考古發現，均對此提供了有力的實物佐證。

香山有眾多海邊沙丘文化遺址。目前發現的最早遺址約距今6,000年左右。從新石器中期到晚期，其代表性文化遺存有南朗鎮龍穴村、泮沙村、板芙鎮白溪村、張家邊宮花村、小隱村、沙邊村、沙溪鎮秀山村、大湧鎮嵐田村等處，以及澳門黑沙下文化層、珠海淇澳島後沙灣、三灶草堂灣、平沙棠下環、荷包島鎖匙灣、高欄島寶鏡灣、菱角咀、東澳灣、水井口、西瓜鋪、老虎溝等新石器遺址。<sup>(5)</sup> 說明6,000年以前，香山海島的海灣沙丘上，便有先民倚海群居，他們依靠海洋，征服海洋，創造和積累了豐富的海洋生活經驗。

香山先民靠海為生，主要經濟活動是打漁。各處遺址出土大量漁網網墜。珠海高欄島寶鏡灣遺址出土網墜達1,000件；珠海平沙棠下環遺址出土網墜800件；珠海荷包島、高欄島寶鏡灣和平沙棠下環遺址均發現石錨，說明香山先民航海的發達。<sup>(6)</sup>

考古發掘出土的許多實物和摩崖石刻，都是香山先民在同海洋拚搏中謀生存、求發展的見證。澳門路環島和珠海寶鏡灣遺址發現摩崖巖畫，其中寶鏡灣藏寶洞的巖畫高達2.9米，長5米，尤為重要。畫面以海船為中心，刻劃了一個

宏大的舞蹈和祭祀場面。有人認為，這是香山先民“祈求祖先和神靈保佑在海上航行平安、捕撈豐收、氏族興旺”<sup>(7)</sup>，是一幅“古越人平安航海圖”。<sup>(8)</sup>

## 香山海上貿易的開端

香山人從原始時代開始就漂泊海洋，以漁獵謀生，經濟生活外向化。進入文明時代以後，香山人更是奮力向外發展。在古代封建王朝閉關自守時代，海洋商業活動是香山海洋文化的主要特徵之一。1985年外伶仃石湧灣遺址發現一件漢代陶片，肩部豎刻隸書“朱師所治”四字<sup>(9)</sup>，朱師是陶工的名字，說明漢代香山地區與陶瓷貿易的關係。1969年金灣區南水鎮蚊洲島發掘出青瓷碗碟212件；1977年和1984年漁民在外伶仃島海域和荷包島海域撈獲兩批唐代陶瓷，出水的大量青瓷碗碟、四繫罐和青釉瓷碗，這是香山充當海上陶瓷之路的有力證明。

1548年出版的明代嘉靖《香山縣誌》，開始有正式的文字記載香山海舶貿易的情況：

九星洲山九峰分峙，多石巖、石屋，靈草石上溜水甚美，為番舶往來所吸，曰天塘水。（卷1〈風土志〉）

小橫琴山下有雙水坑，大橫琴山幽峻，為寇所伏；深井山即仙女澳也，亦名井澳，在橫琴下；三灶山三石似名，與橫琴相對，皆抵南番大洋，元末海寇劉進所據。明初寇平，後居民吳進深通蕃為亂。洪武二十六年平定。（卷1〈風土志〉）

九澳山上，東南面對橫琴中水，曰外十字門，其民皆島夷也。（卷1〈風土志〉）<sup>(10)</sup>

以上記載說明當時香山縣島嶼形勢幽峻，泉水甘美，元末以來多有番舶前來停泊，吸取泉水。海寇劉進，居民吳進深勾結番舶為寇：

遇官軍則稱捕魚，遇番賊則同為寇，出沒劫掠，殊難管轄。（卷1〈風土志〉，卷8〈雜誌〉）

由此可見，在元末或明初洪武年間，即七百年以前，香山的海外貿易已經十分活躍。常常被視為通番作亂，而遭到當局的嚴厲控制和打擊。但通番貿易的優厚利潤，仍使香山人趨之若鶩，無法禁絕。

及至1405-1433年間，永樂皇帝命令三寶太監鄭和七下西洋以後，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發展了封貢貿易關係。不少國家紛紛派遣貿易使團前來中國朝貢。而此時的香山也是外國朝貢的一條主要貢道。

據嘉靖《香山縣誌》記載，洪武二十六年（1393），彭豫任香山縣丞期間，政績斐然，深得民心。但後來有一樁入京的外國貢品發生問題。

時外裔貢方物，自香山入京，典其事者失封緘。朝廷遣御史按問。事連豫，其子啟願以身代，邑民皇皇，恐豫得重罰。會赦獲免，民大喜迎以歸。坐是不得遷。<sup>(11)</sup>

這一事件發生於14世紀末。外國進貢船隻停泊香山口岸，自香山入京。封緘又稱勘合，是外國商船入境貿易的憑證。但辦理入境手續的官員不小心丟失封緘檔，這屬於嚴重失職事件。彭豫因此受到牽連，遭受上司問罪處罰。所倖後來獲赦免。從港口條件來看，當時外國貢船很可能就是停泊在澳門一帶海面。

清人尤侗有一首外國竹枝詞〈默德那〉，曾明確指出澳門當時已是外國貢船的停泊口岸。他寫道：

香山濠鏡辨光芒，妙女兒干進秘方。  
最是同儕多意氣，鄭莊千里不齋糧。<sup>(12)</sup>

尤侗在該詩題記中說：“回回識寶附舶香山濠鏡澳貿易，正德中進女你兒幹、於永獻房中秘方。”

濠鏡澳就是澳門。默德那即今阿拉伯半島的麥迪那。明武宗正德年間，即1506-1520年，其時有阿拉伯國家貢船停泊澳門。尤侗雖是清代人，但他曾經參加編撰《明史》，熟悉外交史料，《明史》〈佛郎機傳〉就出自他的手筆。他還根據手頭

的豐富資料，寫了一組〈外國竹枝詞〉，〈默德那〉是其中的一首。由此可見，香山的澳門早在16世紀初以前，就是一個通番貿易知名的船口，有阿拉伯人在此貿易，並由此經廣州進京。

到了1570年代，據黃佐嘉靖年間編撰的《廣東通志》指出：香山縣的浪白、濠鏡、十字門等是廣州地區沿海的船口之一。

當然除了香山三個船口之外，廣府濱海各縣也同樣通番貿易，並湧現了許多外國商船的停泊貿易點。其中最著名的船口，新寧有廣海、望峒、奇潭；東莞有虎頭門、屯門和雞棲，等等。<sup>(13)</sup> 古代香山的海洋文化與它們並無多大差別，它們的文化特質是一樣的，在通番貿易方面的作用也是相同的。可以說，這時是諸澳並存、各自貿易的局面。

### 黃佐與香山市舶貿易的發展

但是16世紀初年，由於葡萄牙人海盜貿易船隊的入侵，中西文化在珠江口發生第一次激烈碰撞，對一向平靜的廣東海外貿易造成極大的破壞。葡萄牙海盜侵入南海，踞佔屯門，在珠江口瘋狂劫奪行旅，掠買男女，給沿海人民帶來災難和悲憤。1522年中葡發生屯門之戰，結果中國軍隊將盤踞屯門五年的葡人驅逐後，明朝政府厲行海禁，完全斷絕海舶貿易，長期從事海外貿易的沿海人民生活大受影響，廣東地方政府也失去了大量貿易稅收入。黃佐說：

正德十二年，西海夷人佛郎機亦稱朝貢，突入東莞縣，火銃迅烈，震駭遠邇，殘掠甚至炙食小兒。海道奉命誅逐，乃出境。自是海舶悉行禁止，例應入貢諸番亦鮮有至者。貢舶乃往漳泉，廣城百貿蕭然，非舊制矣。<sup>(14)</sup>

其中海外貿易較為發達的香山地區所受影響更為巨大。據黃佐《廣東通志》記載：

廣民本事貧，然魚米本賤，而又有番舶貿易之利，故家雖無十金之資，而用度自足負擔

者。苟持一錢出市，可以得飽。蓋操利易而物價平故也。近年以來，地方日窘，利源日竭，市賈蕭條，貧者十九。<sup>(15)</sup>

於是來自民間的解除海禁的呼聲越來越高，廣東官員接連請求恢復市舶貿易。遂在政府官員間引發了激烈爭論。對此，原籍廣東東莞的王希文極力主張對朝貢貿易嚴加限制：

乃乞申明祖宗舊制，凡進貢必有金葉表文，來者不過一舟，舟不過百人；附搭貨物，不必抽分，官給鈔買，頑民不許私相接濟。如有人貨兼獲者，全家發遣，則夷貨無售其私，不待沮之而自止矣。番舶一絕，則備倭可以不設。<sup>(16)</sup>

王希文當時在京城任給事中之職，是個京官，不瞭解依賴海外貿易的廣大人民的切身感受。他的嚴海禁政策不符合廣東的情況，難以使民情平服。

這時候，1529年廣東巡撫林富的奏疏扭轉了廣東海洋貿易的形勢，促使朝廷宣佈放鬆海禁，恢復市舶貿易。但這個著名奏疏作者不是林富，而是廣東著名學者和改革家黃佐。

黃佐（1489-1566），字才伯，號泰泉，廣東香山石岐人。出生於書香世家，少聰敏好學，幼承家風，三歲即受《孝經》，八歲鑽研詩、詞以及天文、曆算之書。二十一歲中解元，三十一歲中進士。曾任翰林苑編修，因秉性率直，而遭受當局排斥。乃於中年淡泊功名，絕意仕途。歸來後居廣州白雲山，創辦泰泉書院，廣收弟子，教書育人。講學之餘，潛心著述，碩果累累，在明代學壇獨樹一幟，成為嶺南一代儒宗。他從小深受嶺南海洋文化的影響，治學思想講求實際，着重經世致用之學，在地方文獻方面貢獻尤為卓著。先後撰成《廣州人物傳》、《廣州市府志》、《廣東通志》、《羅浮山志》、《廣西通志》、《香山縣志》等書。黃佐於這些書中深入研究山川形勢，地理環境，物產風俗；十分關注社會的治亂興衰，以及人民的生產和生活狀況。尤其對海外貿易活動

十分重視。在他的〈粵會賦〉中，多處着墨描述廣州的海外貿易繁榮的情況：

百粵之會，是為南海。(……) 萬里帆檣，蠻煙蜚雨，胡賈鼎來，所居成聚。(……) 寶泉貨之淵藪，夷夏之都會也。(……) 島舶之來，有粲其實，錯鐐、鎖釧、璠璣、瑾瑜、璣玕、瑟瑟、璵璠、瑪瑙、玻璃、珊瑚、瑠璃、龜筒、鶴頂、犀角、象齒、貓睛日耀，鴉鵲霞綺，流黃空青，縹碧紫英，其炮如雲，其煥如星。蓋廣南之富，傳自古昔。<sup>(17)</sup>

黃佐對香山海洋文化進行了深入的考察和研究，並從關心人民生活出發，主張發展海外貿易。他說：成化、弘治之世，貢獻至者日夥，有司惟容其番使入見，餘皆留停於驛，往來設燕管待，方許入城。衣服詭異，亦有帽金珠、衣朝霞者，老稚咸競觀之。椒木、銅鼓、戒指、寶石溢於庫，市番貨甚賤，貧民承令博買，多致富。<sup>(18)</sup>

可是，此時廣東由於海禁而使經濟陷入困境。在此關鍵時刻，黃佐決定公開站出來振臂高呼，要求政府改變政策，解除海禁，恢復和發展廣東的海舶貿易。於是1529年，由黃佐捉筆，撰寫了〈代巡撫通市舶疏〉（即〈林富奏疏〉）<sup>(19)</sup>，以巡撫林富的名義向朝廷呈報。

在奏疏中，黃佐首先指出，中國與東南亞國家存在歷史悠久的朝貢貿易關係，明朝根據各國的不同情況，分別規定貢期為兩年、三年或五年一次，指定廣東等省為朝貢的貢道。朝貢品一般為本國的特產，如各種香料、海珠、寶石、稀有禽獸和手工業產品等。中國政府接受貢品後，依例給予“賞賜”，通常為絲織品、瓷器、金銀和錢鈔等。一般來說，賞賜遠比貢品價值高得多，使得各國貢使乘興而來，滿意而返。這種朝貢關係，實質上是一種官方貿易關係。各國貢使定期到中國來，除了完成官方朝貢外交禮儀之外，還附載貨物進行貿易。這種貿易的商品數量，遠遠超過朝貢物品的數量。黃佐說，這種朝貢貿易，“送迎往來，懋遷有無，柔遠人而宣盛德也”。在遠東封貢體系中，繁榮富強的中國像

磁石般緊緊吸引着周邊國家；在雙方以朝貢關係維持的頻繁交往過程中，中國在政治經濟和文化方面對遠東各國產生了重大影響，促進了這些國家的繁榮與進步。但是“至正德十二年，有佛郎機夷人，突入東莞縣界，時布政使吳廷舉許其朝貢，為之奏聞，此則不考成憲之過也。厥後獷狁章聞，朝廷准御史邱道隆等奏，即行撫按，令海道官軍驅逐出境。誅其首惡火者亞三等。餘黨聞風懾遁。有司自是將安南、滿刺加諸番舶，盡行阻絕”。厲行海禁之後，破壞了這種傳統的朝貢貿易體制，也就損害了與東南亞國家的傳統友誼。“今以除害為民，並一切之利禁絕之，使軍國無所資，忘祖宗成憲，且失遠人之心。”這是海禁政策的巨大失誤。

其次，根據《皇明祖訓》和《大明會典》，而允許朝貢的國家，安南、真臘、暹羅、占城、蘇門答刺、西洋、爪哇、彭亨、白花、三佛齊、勃泥諸國，因廣東貿易被盡行阻絕，“皆往漳州府海面地方，私自駐紮，於是利歸於閩，而廣之市井蕭然矣”。廣東朝貢貿易被迫停頓，福建的非法走私貿易卻得到畸形發展，大獲其利。黃佐認為這種情況很不正常。他指出，“夫佛郎機素不通中國，驅而絕之宜也。《祖訓》、《會典》所載諸國，素恭順與中國通者也，朝貢貿易，盡阻絕之，則是因噎而廢食也。況市舶官吏，公設於廣東者，反不如漳州私通之無禁，則國家成憲安在哉？”他的論辯充分反映了廣東人民對貿易蕭條狀況的憤慨。

緊接着，黃佐又指出，解除廣東海禁，恢復市舶貿易，於國於民皆大有好處：

其一，這樣做就能夠增加財政收入以充實國庫，“舊規番舶朝貢之外，抽解俱有則例，足供御用”。

其二，市舶稅收也能增加地方收入，解決地方軍餉開支問題。“除抽解外，節充軍餉，今兩廣用兵連年，庫藏日耗，藉此可以充羨，而備不虞。”

其三，如果地方財政收入寬裕了，就可減輕人民的捐稅負擔，有利於社會的安定。“廣西一省全仰給於廣東，今小有徵發，即措辦不前，雖折俸折米，久已缺乏，科擾於民，計所不免。查

得舊番舶通時，公私饒給，在庫番貨，旬月可得銀數萬兩。”

其四，恢復市舶貿易之後，還可使人民得以從事小買賣以謀生，增加人民的收入，從而改善人民的生活。“貿易舊例，有司擇其良者，加價給之，其次貧民買賣。故小民持一錢之貨，即得握椒，輾轉交易，於以自肥。廣東舊稱富庶，良以此耳。”

黃佐主張在廣東奉行開放貿易政策不是無原則、不受限制的，他認為在實行開放政策的同時，要採取幾點措施：

第一，政府必須嚴格控制局面，保證貿易正常進行。尤其是“於洋澳要害去處，及東莞縣南頭等地面，遞年令海道副使及備倭都指揮，督率官軍，嚴加巡察”。

第二，嚴格規定來華貿易的外國商船，必須是“祖訓會典之所載者”，即與中國有友好關係的國家派來的，並且須是“具有朝貢表文者”，即貿易手續齊全的商船。

第三，凡是“祖訓會典之所不載者”，即與中國素無關係的外國商船，“如佛郎機國，即驅逐出境，如敢抗拒不服，即督發官兵擒捕”。

黃佐認為，如果實行開放政策，而又施行上述幾點措施，那麼廣東的對外貿易就能做到“懷柔有方，而公私兩便”。“不惟足興一方之利，而王者無外之道，亦在是矣”。

黃佐最後請求中央政府，“將臣所陳利害，逐一參究，如果可行，乞行福建廣東，將今番舶之私商駐紮者，概行逐去，具有朝貢表文者，許住廣州洋澳去處，俟官司處置”。

廣東巡撫林富把黃佐代筆的奏摺呈送中央政府後，立即引起熱烈的討論。政府中有官員堅決反對廣東開放海禁。刑部給事中王希文是最堅決的反對派。當時王希文與黃佐之觀點分歧的焦點是，如何處理朝貢國家所附帶的貨物問題，王希文堅持：

附搭貨物，不必抽分，官給鈔買，頑民不許私相接濟。如有人貨兼獲者，全家發遣，則夷貨無售其私，不待沮之而自止矣。

而黃佐則主張：

凡安南等國，載在《祖訓》，例應入貢者，果是依期而至，比對朱墨，勘合相同，帶夾番貨照例抽分，應解京者解京，應備用者備用，抽分之外，許良民兩平交易，以順夷情。

王希文聲稱，中國與外國貿易，“不過因而羈縻之而已，非利其有也”。厲行海禁將使“番舶之害可永絕，而疆圉之防可永固”。這種主張調子很高，卻不合時宜。當時兩廣總督霍韜認為：

東南夷皆由廣入貢，因而貿易，互為利市焉。中國不可拒之自困。惟佛郎機之夷則虜之桀也，不可不拒。因拒佛郎機並拒諸夷，非策也。為今之策，在諸夷之來則受之，在佛郎機則斥之。否則厲兵以防之，示之必誅。<sup>(20)</sup>

當時主管海防問題的是兵部尚書汪鋐，他之前審理王希文的奏疏，認為主張嚴禁有理。但閱讀了黃佐奏摺後，立刻被其雄辯的氣勢所折服，於是改變觀點，轉而贊同廣東開放海禁的請求了。<sup>(21)</sup> 其後都察院在討論中亦主張“番貨抽分交易如舊”。<sup>(22)</sup> “奏上得允，於是番舶迺通焉”。<sup>(23)</sup>

〈林富奏疏〉扭轉了海禁的形勢，恢復了順應民心的市舶貿易，標誌着明代中期海禁政策的轉捩點。廣東官員為了維護傳統海洋貿易，頂住巨大壓力，堅決要求實施開放海禁，幾經波折，終於達到了目的。因此被認為著名奏疏載入《明史》。而黃佐通過撰寫〈林富奏疏〉，證明他不僅是名重一時的儒學大師，更是關心人民生活的經濟改革家，為廣東海洋經濟的復蘇和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 澳門開埠與文化的一枝獨秀

黃佐奏章還直接推動了香山海洋文化的發展，並使之進入全新的階段。重新開放市舶貿易

後，1535年，廣東政府宣佈了一項重大決定：將市舶司移設於香山濠鏡澳。這一舉措，為此後澳門貿易的繁榮打下了最初的基礎。

廣東當局在移設市舶司時，為甚麼不考慮其它澳，而唯獨垂青於澳門呢？無疑的，首先是因為澳門的港口條件較諸其它澳優勝一籌，例如它是半島，與大陸相連，與省城相去不遠，較為方便外國商船進行貿易活動，還有商船能夠及時獲取糧水供應，等等。屈大均詩句：“廣州諸港口，最是澳門雄。”<sup>(24)</sup> 說的便是澳門在這方面的優勢。

本來16世紀30年代初，廣東放鬆海禁，開始恢復對外貿易之時，外國商船相率集聚於香山、東莞、新寧縣各個港口停泊貿易，“而浪白澳為尤甚”<sup>(25)</sup>。但浪白澳風高浪大，“水土甚惡，難久駐”<sup>(26)</sup>。因此外國商人通過賄賂中國官員，要求將市舶司遷至香山澳門。

《明實錄》說：

先是，暹羅、東西洋、佛郎機諸國入貢者，附會而進，與土著貿遷，設市舶提舉司稅其貨。正德間，移泊高州之電白縣。至嘉靖十四年，指揮黃瓊納賄，請於上官，許夷人僑寓濠鏡澳，歲輸二萬金。<sup>(27)</sup>

如此看來，澳門港口條件優越，外商積極活動要求停泊澳門貿易，甚至使用了行賄手段，以求達到目的。但除此之外，可能還有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這就是，黃佐奏疏對於解除海禁政策的卓越作用，使廣東政府對香山澳門倍加重視。還有黃佐提出的有關市舶貿易的防範措施，廣東當局認為在黃佐的家鄉香山澳門推行會更好。因此種種，遂決定將市舶司移設於香山澳門，而將“諸澳悉廢”。

市舶司移駐澳門這一舉措，意味着珠江口從此有了海外貿易中心，那就是澳門。黃佐前面所說的通市舶貿易有四點利益，其中一二兩點是為國家謀得利益，而其後兩點好處均為香山所得。市舶司移設澳門使香山獲益甚多。這也是廣東當局鑒於黃佐代擬林富奏章的功勞，而對香山地區

貿易的特殊關照。而由此帶來的重要變化則是，由於“諸澳悉廢，而濠鏡獨為舶藪”<sup>(28)</sup>，使香山海洋文化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

由此可見，16世紀中期以後，澳門成為全國唯一的對外貿易港口、外國人的居留地和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中心。從澳門出發，沿着漫長的貿易航線，東北面與日本、琉球和菲律賓相通，西南面穿過麻六甲海峽進入印度洋，可到達東南亞和南洋各國，直抵非洲東岸。再沿好望角北上，通往歐洲。澳門的開放引發香山文化的巨大變化。而澳門地位的巨變，則成為香山文化變化的轉捩點。此後香山文化突然發力前進，逐漸與世界海洋文化直接通連了，並且形成了某些獨有的特色。這一特色主要通過澳門表現出來。

隨着澳門港口的發展和對外貿易的繁榮，中西文化在澳門交匯融合。當時澳門聚集了歐、亞、非、美等洲大約二十多個國家的商人。其中有歐洲的葡萄牙、西班牙、英國、法國、荷蘭、俄國、丹麥、意大利等國；美洲的美國；非洲東部的索馬里；以及亞洲的阿拉伯半島、印度半島、印尼群島、馬來半島、中印半島、菲律賓群島和日本群島的古代國家。澳門逐漸形成了多元混合的文化。

澳門文化的多元性具有以下特徵：一是人口的多元組合。澳門是一個典型的移民城市，人口增長的過程，也是人口多元化組合的過程。葡萄牙人居留澳門以後，澳門成為中外貿易和文化交流的“總匯之區”。<sup>(29)</sup> 澳門的人口構成包含了數十個國家，已經成為一個國際化的港口城市了。但澳門人口的主體是中國人。據1970年統計，中國人佔96.53%，葡人佔3.08%，其他四十七個國家國籍的人佔0.47%。澳門有大約1,800名混血種人，這是幾百年來中外人種雜居與和諧相處的結果。

二是社會文化現象的多元性。中西文化經過在澳門幾百年的交融會通，如今，澳門文化的多元性，貫穿於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首先是語言文學多元化。現在澳門的公務員和教師隊伍中，除了華人和土生葡人外，往往還有人來自其他國家，工作中常常使用華語、葡語或英語為溝通工

具。與此同時，澳門文學從一開始就是東西方色彩並存的。其中土生文學是澳門文學獨特的部分。

其次是教育多元化和多樣化。澳門學制大體可分為三種：即中文學校的中國學制；葡文學校的葡國學制；以及英文學校的英國學制。學制多樣化是澳門社會多種文化共存的現實反映。還有傳媒多元化和多樣化。澳門是中國最早出現報紙的地方。1822年9月2日創刊的葡文《蜜蜂華報》(Abelha da China)，既是澳門最早的報紙，也是中國土地上出現的最早的報紙。目前澳門中文日報有葡文報紙，還有許多中文、葡文和英文的週報、無線電廣播台、電視台。

此外澳門地名、人名、陵墓也是中西合璧的。澳門的每一條街道和馬路，都有中文名和葡文名。澳門墳場共有十座，墳場原有中西之分。不過內中也有中國人埋葬於西洋墳場，或西人埋葬於中國墳場。如埋葬在舊西洋墳場的華人知名人士有何賢(澳門總商會會長)、劉玉麟(曾任駐英大使)和呂和隆(清朝奉政大夫)。新西洋墳場則埋葬着著名嶺南畫家高劍父的遺骨。有的墓碑分別刻着中文和英文碑文。所有這些都說明中西文化在澳門之和諧相處與相互融合。

最後，還有宗教信仰的多元化。除了儒釋道教和天主教是澳門人的主要信仰之外，尚有其它宗教如：基督教、伊斯蘭教、巴哈伊教、摩門教、新世界會社、神慈秀明會、瑣羅亞斯德教(白頭教)、基士拿教、新使徒教會、阿南達瑪迦(意為喜悅之路)等等。在澳門這方狹小的土地上竟同時並存着十多種大小不一的宗教信仰。

澳門中西文化和諧相處，彼此交融混合，到處充滿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一種混合文化或和諧文化現象。例如，中葡雙語馬路和雙語街名文化遍佈全澳；澳門的兩大宗教——天主教與佛教和諧相處，常常聯合出席重大慶典，如澳門大橋、澳門機場以及澳門文化中心建成的慶典，都曾同時舉行天主教祝聖儀式和佛教的開光儀式，進行宗教祈福活動；一個家庭往往有兩種宗教信仰，或有人既信奉神佛又參拜天主。有的家庭中，老人信佛，年輕人去教堂做禮拜，各有所好，大都能相安無事，見怪不怪。這種社會氛圍，充分體

現了澳門東西方文化數百年交匯的歷史特徵。又如每逢重大節日，會有耶穌聖像與包公、關帝像一同在澳門出遊的熱鬧情景。<sup>(30)</sup> 每當澳門西方人奉聖像出遊。澳門華人也不甘寂寞，他們也奉包公、關帝的神像出遊，使得節慶氣氛更加熱烈。<sup>(31)</sup> 澳門華洋雜處，甚至共居一屋，葡人居樓上，華人居樓下，生活方式各異，彼此友好往來，甚至相互通婚。這些事實說明，澳門中西文化之和諧共存，堪為典範。

澳門的華人與洋人在相互吸收對方文化的同時，又都始終保持本國的傳統文化。澳門居住的中國人無論接受了多少西方的新思想和新文化，但都沒有被同化。因此吸納西方先進文化成就，並不意味着中國傳統文化的消失，相反，將會使中國傳統文化更加發揚光大，從而更加增強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澳門這樣的中西文化混合的海港城市，當時為中國僅見。

### 香山海洋文化的歷史意義

綜上所述，海洋文化培育出香山人海納百川的精神，他們在同西方文化接觸中，不斷積極吸納其先進文化成分，來豐富本身的精神的和物質的文化生活。明清以來，西方不斷將最新的工藝產品（如顯微鏡、大字鏡、照字鏡、眼鏡、鐘錶、天鵝絨、大呢或小呢、緞和紗（稱為雨紗、雨緞）、香水（花露水，即薔薇水）農副特色產品（蕃薯、洋蔥），以及煙草、鼻煙、西洋文學藝術、西洋建築藝術、繪畫、音樂、語言文字等等傳入澳門。而香山人無疑是最先享受這些西方新文化玩意的中國人。

海洋文化發達的表現之一，就是向海外移民人口的眾多。香山人很早就交通海外，漂泊異國他鄉。長洲黃族祖先是記載的香山最早僑民。宋代寶祐年間（1253-1258），新會杜阮進士黃敬齋奉使安南國（今越南）。回國途中，遇颶風滯留在國外十數載，並與香山三鄉平嵐村林姓女結婚。元初回國，擇香山長洲村而居，為長洲村開村始祖。<sup>(32)</sup>

澳門開埠後大批香山人出國，當然也包括很多人被賣豬仔而出洋做苦工。這樣香山海外華僑

達四十一萬之多，分佈於九十多個國家和地區，成為著名的僑鄉。<sup>(33)</sup>

長期在海外打拚的香山華僑中不乏成功人士，如陳芳（1825-1906），前山梅溪人，夏威夷鉅賈，樞密院議員，清朝駐夏威夷領事；鍾工字（1865-1960），三鄉西山人，夏威夷實業家；楊著昆（1853-1931），北臺村人，檀香山糖業鉅子；鍾工字，唐雄，夏威夷銀行家實業家；孫眉、鄭仲，檀香山著名牧場主。

香山人向來具有寬廣胸懷，遠大志向。他們出於仰慕西方文化，最先從澳門走向世界，學習和體驗西方文化，用以拯救危局，振興中華。

鄭瑪諾是第一個出洋留學的香山人，當然他和之後一些人都祇是為了宗教目的出洋留學。至鴉片戰爭後，香山人容閔留學美國，尋找救國真理。為了讓更多中國人學習歐美先進文化來振興中華，容閔從1872年起曾先後三次組織學童赴美留學。總數一百二十名學童中，香山人佔三分之二。稍後的鄭觀應學習西方富國強兵之道，撰寫《盛世危言》一書，向國人敲響警世鐘。革命偉人孫中山到美國夏威夷學習西方文化，提出“驅除韃奴，振興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的革命綱領，宣導反封建民主革命。20世紀初，繼續有劉思復、鄭彼岸、林君復等一大批香山人出洋留學，參加同盟會，開展革命活動，領導香山革命，推翻千年封建帝制，立下偉大功勳。

在海洋文化的滋養下，香山湧現出無數敢為天下先的創新人物，對近代中國政治經濟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其中，革命志士和軍政要人有：沈志亮、楊應麟，反抗澳葡擴張的民族志士；劉麗川，小刀會起義軍領袖；陸皓東，為共和革命捐軀第一人；蘇兆徵，中國工人運動領袖；林偉民，第一屆中華全國總工會委員長；楊仙逸，中國航空之父、航空局長；張惠長，駕機環飛全國第一人，航空局副局長；程璧光，民國海軍總長；陳慶雲，海陸空三軍司令；楊官宇，中國第一位航校校長；朱慕飛，中國第一位女飛行員；唐紹儀，民國第一任內閣總理；孫科，民國行政院院長；吳鐵城，民國行政院副院長。

此外，香山商界精英和文化名家有：馬應彪、郭樂、蔡昌和李敏周，他們分別為民國四大著名百貨公司先施公司、永安公司、大新公司和新新公司的創始人；徐潤、唐廷植、莫仕揚、鄭翼之四家族均為近代著名買辦實業家；黃勝，中國近代印刷業開拓者；黃寬，留學英國的第一位西醫；唐國安，清華大學首任校長；鍾榮光，嶺南大學首任校長；蕭友梅，現代音樂教育家；蘇曼殊，近代文學藝術家，翻譯家；王雲五，著名出版家，四角號碼字典發明人。

這些香山精英們的業績熠熠生輝，他們的首創精神在當時引起社會的震動，堪稱當代的典範和榜樣，鼓舞着更多的人們去開拓創新。推動着社會政治經濟和科學文化的革命向前發展，並最終使香山成為近代民主革命的發源地。

#### 【註】

- (1) 樂史：《太平寰宇記》，轉引自《中山市志》廣東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上卷，頁126。
- (2) 黃佐：《嘉靖香山縣誌》卷1〈風土志〉。
- (3) 《永樂大典》，引陳大震《南海志》(1408條)。
- (4) 何大章：《中山地形志》，中山文獻委員會1950年1月出版，頁79-82。
- (5) 肖一亭：《珠海沙丘遺址研究》，珠海出版社2006年版，頁293-298。
- (6) 肖一亭：《珠海沙丘遺址研究》，珠海出版社2006年版，頁300。
- (7) 徐恒彬等：〈高欄島石刻岩畫的發現和研究〉，《珠海考古發掘與研究》，廣東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 (8) 姜永興：〈古越人平安航海圖——珠海寶鏡灣摩崖石刻探秘之一〉，《海洋文化論集》。
- (9) 珠海市博物館編：《珠海市文物志》珠海出版社2007年，頁59。
- (10) 黃佐：《嘉靖香山縣誌》卷1〈風土志〉，卷8〈雜誌〉。
- (11) 黃佐：《嘉靖香山縣誌》卷5〈官師〉。
- (12) 尤侗：《西堂詩集》，〈外國竹枝詞·默德那〉。尤侗所寫的明武宗的生活逸事是有根據的。武宗荒淫無恥，築密室“豹房”淫樂。於永、女你兒乾等確有其人。《明武宗外紀》寫道：“有言錦衣衛都督同知於永善陰道秘術，遂召入豹房，與語大悅。永色目人，進言回回女暫潤而嵯黎，大勝中土；時都督呂佐亦色目人，永矯旨索佐回女善西域舞者，得十二人以進，歌舞達晝夜。顧猶以為不足，乃諷上請召諸侯伯中故色目籍家婦人入內，駕言教舞，而擇其美者留之不令出。”又：“回回進女你兒幹。”這些記載無疑都是可信的。又《明史》中也有於永獻房中秘方的記載：“(強尼)自稱皇庶子，引樂工臧賢，回回人於永，及番僧以秘戲進，請於禁內建豹房新寺，恣聲伎為樂。”見毛奇齡：《明武宗外紀》，上海神州國光社1941版，頁13-14。又《明史》卷307，頁8636，《強尼傳》。又見陳仁錫：《皇明世法錄》，卷81，〈西戎·默德那〉。
- (13) 見黃佐：《廣東通志》卷66，〈外志〉；屈大均：《廣東新語》卷2〈地語·澳門〉。
- (14) 《嘉靖廣東通志》黃佐卷66〈外志〉三“番夷”。
- (15) 《嘉靖廣東通志》卷20〈民物志〉一。
- (16) 王希文：〈重邊防以甦民命疏〉，參見《明史》卷325〈佛郎機傳〉。
- (17) 黃佐：〈粵會賦〉，申良翰：《康熙香山縣誌》卷8〈藝文志〉。
- (18) 《嘉靖廣東通志》黃佐卷66〈外志〉三“番夷”。
- (19) 顧炎武：《天下郡國得病書》卷120，〈海外諸番入貢互市〉引“林富奏疏”。《泰泉集》卷20〈代巡撫通市舶疏〉。
- (20) 霍韜：《霍文敏公全集》卷10下，〈兩廣事宜〉。
- (21) 汪鋹奏章，見(明)黃訓《名臣經濟錄》卷43，〈兵部職方〉。
- (22) 《明世宗實錄》卷118，嘉靖九年十月辛酉條。
- (23) 黃佐《嘉靖廣東通志》卷66〈外志〉三“番夷”。
- (24) 屈大均：〈澳門詩〉六首，見印光任張汝霖：《澳門紀略》上卷〈形勢篇〉。
- (25) 胡宗憲：《籌海圖編》卷三，〈廣東事宜〉。
- (26) 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一二，〈廣東〉。
- (27) 《明熹宗實錄》卷一一，天啟元年六月丙子條。屈大均也說“嘉靖間，諸番以浪白遼遠，重賄當事，求蠶鏡為澳”，從而“諸澳悉廢，而蠶鏡獨為舶藪”。(屈大均：《廣東新語》卷2，〈地語·澳門〉)。
- (28) 屈大均：《廣東新語》卷2，〈地語·澳門〉。
- (29) 〈請將高廉道暫駐澳門查辦中外貿易等事務片〉，中山大學歷史系中國近現代史教研組研究室編：《林則徐集·奏稿》中，中華書局1965年版，頁714。
- (30) 據1895年3月6日出版的《鏡海叢報》記載，澳門舉行了一次“奉神出巡”活動：“月之初六日為西洋慶喜之辰。是晚，天主教奉其教中所供之耶穌像，巡行各道，以便教人瞻仰。初六晚七點鐘，由龍嵩廟請出神像，送至七廟；次日四打鐘，再具儀仗迎神出巡，中西奉教之眾，皆持白燭跪伏於路。”
- (31) “又連日澳中華人紳商，因在醫院集議，奉華元化、包孝肅、關壯穆各神巡遊街道，籍逐休祥而驅疾厲。各街好事者多斂錢物，灸豕燃燭，以將誠敬。”同上註。
- (32) 黃漢強、黃詠勳主編：《長洲村志》2006年版，頁10。
- (33) 2000-2002年；全市僑情調查統計，中山籍華僑華人及港澳同胞達八十多萬人，分佈在九十個國家和地區。其中華僑華人四十一萬多人。見陳迪秋主編：《中山華僑志》，2011年11月版，頁110。